

200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批准号 00BJL012

经济运行周期中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
交替转换的机理及对策研究

主持人 王建国

二 00 二年十二月

经济运行周期中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 交替转换的机理及对策研究

主持人 王建国

课题执笔人：王建国 刘 珂

课题组成员：彭诗金 刘 珂 焦军普

周 柯 郭小红 刘淑利

二 00 二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一、经济周期与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转换的理论关联分析
- 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及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转换的历史考察
- 三、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 四、我国建国以来经济运行周期的实证分析
- 五、我国经济波动周期的特征
- 六、我国经济运行周期中价格总水平波动的实证相关分析
- 七、改革前后我国价格总水平波动周期的特征变化
- 八、我国经济运行周期中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交替转换出现

第二章 关于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一般理论分析

- 一、关于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内涵和本质
 - (一) 通货紧缩的含义和本质
 - (二) 通货膨胀的内涵和本质
- 二、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量的测度
 - (一) 通货紧缩的测度
 - (二) 通货膨胀的量
- 三、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类型及程度度量
 - (一) 通货紧缩的类型及程度度量
 - (二) 通货膨胀的类型及程度度量
- 四、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经济社会效应
 - (一) 通货紧缩的经济社会效应
 - (二) 通货膨胀效应及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

第三章 美日两国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转换的实证考察

- 一、美国二十世纪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转换的历史考察
 - (一) 由 20 年代以前的通货膨胀向 20—30 年代通货紧缩的转换
 - (二) 由 20—30 年代通货紧缩向 70—80 年代滞胀的转换
 - (三) 由 70—80 年代滞胀向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通货紧缩的转换
 - (四) 美国二十世纪 20—30 年代通货紧缩的原因分析和治理对策
- 二、日本 20 世纪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转换的实证分析
 - (一) 由 20 世纪初的通货膨胀向 20—30 年代通货紧缩的转换
 - (二) 由 40 年代通货膨胀向 50 年代通货紧缩的转换
 - (三) 由 70—80 年代的通货膨胀向 90 年代通货紧缩的转换
 - (四) 日本二十世纪 90 通货紧缩形成的原因及治理效果分析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转换的实证关联分析

- 一、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实证考察
 - (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状况描述
 - (二) 我国改革以来通货膨胀的特点
- 二、我国通货紧缩的产生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实证关联分析
 - (一) 我国通货紧缩发生的通货膨胀背景
 - (二) 我国通货紧缩的发生
 - (三) 我国通货紧缩的发展
- 三、我国通货紧缩的状况、危害及发生原因探析
 - (一) 对我国通货紧缩的基本判断
 - (二) 我国通货紧缩产生的原因分析
 - (三) 通货紧缩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
- 四、中国通货紧缩与美国 30 年代、日本 90 年代通货紧缩的比较
 - (一) 中美日通货紧缩发生的背景比较
 - (二) 中美日通货紧缩发生的状况比较
 - (三) 中美日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措施比较
 - (三) 中美日通货紧缩比较分析的启示

第五章 经济运行周期中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转换的机理分析

- 一、通货紧缩发生的机理
 - (一)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形成机理
 - (二) 欧文·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机理
 - (三) 伯南科和格特勒的金融加速器模型解释
 - (四) 加利·西林的通货紧缩自循环机理
- 二、通货膨胀发生的机理
 - (一) 货币数量说
 - (二) 通货膨胀缺口模型
 - (三) 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理论
 - (四) 本·汉森的两缺口模型
 - (五) 菲利普斯曲线
 - (六) 通货膨胀理论与 AD—AS 模型
- 三、我国通货紧缩形成机理的探讨
 - (一) “债务—通货紧缩”形成机制
 - (二) “成本上升—企业亏损—通货紧缩”形成机理
 - (三) 信贷约束硬化—通货紧缩形成机理
 - (四) “三性”—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形成机理

- (五) 本报告的观点
- 四、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转换的必然性特征及机理
 - (一)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转换的基本特征
 - (二)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转换发生的机理
 - (三) 我国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转换的必然性
 - (四) 我国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转换发生的机理

第六章 治理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转换发生的政策取向和对策措施

-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
 - (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作用目标
 - (二)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分析
 - (三)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同点及其内在联系
 - (四)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强弱势分析
 - (五)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基本模式及其功效
- 二、对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运作的实证考察
 - (一) 1979—1980 年两大政策的双松配合
 - (二) 1981 年的紧财政、松货币政策配合
 - (三) 1982—1984 年两大政策的双松配合
 - (四) 1985 年两大政策的双紧配合
 - (五) 1986—1988 年两大政策的双松配合
 - (六) 1989—1991 年两大政策的双紧配合
 - (七) 1992—1993 年上半年两大政策的双松配合
 - (八) 1993 年下半年—1997 年两大政策的适度从紧配合
 - (九) 1998 年至今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当货币政策的配合
- 三、治理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转换发生的政策配合方略
 - (一) 反通货膨胀政策和反通货紧缩政策的交替使用
 - (二)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及操作技巧
- 四、治理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综合政策措施
 - (一) 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
 - (二) 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措施
 - (三) 强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 (四) 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 (五)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建议
 - (六) 关于社会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
 - (七) 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第一章 导论

一、经济周期与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转换的理论关联分析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呈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周期性波动过程。经济发展的这种周期性，最直观地表现为总体经济水平上升和下降相互交替的、相对有规律的波动。经济周期一般依次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其中繁荣和萧条是经济周期的两个主要阶段，衰退和复苏是两个过渡阶段。繁荣是指经济活动上升到该周期的最高点，称为波峰或峰顶，这是繁荣的极盛时期，波峰是经济总体水平上升的终点，在这一点，经济发展开始由繁荣转向衰退。萧条的最低点称为波谷或谷底，这是萧条的最严重时期，也是经济总体水平下降的终点，从此点开始经济由萧条转向复苏。西方学者也把经济周期分为收缩和扩张两个阶段，波峰是扩张和收缩两大基本趋势的转折点，波谷则是收缩与扩张两大基本趋势的转折点。

判断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主要指标是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如失业率、物价变动率、经济增长率等。就物价变动率看，一般来说，经济周期的复苏或扩张阶段，物价会呈现为上升趋势，经济发展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反之，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或收缩阶段，物价则呈现为下降趋势，当物价水平持续走低为负增长之后，经济发展将会陷入通货紧缩之中。伴随着连续不断的经济扩张和收缩周期，物价则呈现为相应的上升和下降波动，如果经济衰退阶段物价下降为负增长时，这种与经济周期相伴随的物价变动也就演变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转换的经济现象。

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及其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转换的历史

考察

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825年英国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史的开始。自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循环往复，交替出现，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明显的3~5年或40个月的短周期(基钦周期)、15~20年的中长周期(库兹涅茨周期)、50年左右的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分析的10年的主周期(朱格拉周期或中周期)也明显存在。而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分析，实际上战前的资本主义已经出现过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三次交替转换。第一个长周期转换发生在1789~1849年的60年间，其中1789~1814年的25年是通货膨胀由低到高的时期，1814~1849年的35年为通货紧缩持续蔓延的时期；第二个转换周期是1849~1896年，其中1849~1874年的25年为通货膨胀时期，1874~1896年的23年为通货紧缩时期；第三个周期为1896~1933年，其中1920年以前的14年为通货膨胀时期，一次大战的军事性通货膨胀曾导致了一些国家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1920~1933年的13年为通货紧缩时期，这其中的1929~1933年的4年为著名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物价暴跌，通货严重紧缩，金融体系瘫

疾，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理论界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现象却没有能进行深入的研究。相当多的学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经济的周期波动现象。持这种态度的人把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绝对对立起来。在这部分人看来，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截然相反、水火不相容的，经济现象非此即彼，决不会有共同的可能，也不会有相似的可能。因此，长期认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是同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的，决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发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论述表明，导致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基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可能性。例如，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是经济得以跳跃式扩张的技术基础；货币产生后，商品内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货币形式本身潜伏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可能性；固定资本的周转周期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物质基础。二是主观原因和制度安排上的原因。例如，生产和商业的脱节；社会生产比例的失调；信用制度对经济波动的杠杆影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造成狭小的市场等。

造成经济波动的客观原因表明，尽管《资本论》分析的经济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但产生经济波动的客观条件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得到充分发展的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和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经济，因而不存在产生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客观条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没有完全从根本上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在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更是要发展和培育市场经济，把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再加上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已经建立起来，这意味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依然存在着产生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客观原因，因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必然是周期性波动前进的。

四、我国建国以来经济运行周期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不管是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抑或是在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经济都客观存在着周期性的波动(详见下表)。

由下表可见，1952年我国完成了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从1953年起正式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历程。以GDP增长率的波动为考察对象，按照“谷—谷”法划分，从1953~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共经历了9个周期，改革前有5个周期，改革后有4个周期。

在我国已经发生的9个经济周期中，古典型经济衰退^①（即经济总水平绝对值的减少）全部发生在1976年之前。在1958~1962年的第二周期、1963~1968年的第三周期、1973~1976年的第五周期，都发生了古典型的经济衰退，出现了GDP的负增长。1960、1961、1962、1967、1968、1976共六年GDP增长率

^①（美）Michael P. Niemira and Philip A. Klein:《金融与经济周期预测》，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

建国以来我国GDP增长率变动情况表

年份	GDP增长率 (%)	周期序号	年份	GDP增长率 (%)	周期序号
1953	15.6	1	1977	7.6	6
1954	4.2		1978	11.7	
1955	6.8		1979	7.6	
1956	15.0		1980	7.8	
1957	5.1		1981	5.2	
1958	21.3	2	1982	9.1	7
1959	8.8		1983	10.9	
1960	-0.3		1984	15.2	
1961	-27.3		1985	13.5	
1962	-5.6		1986	8.8	
1963	10.2	3	1987	11.6	8
1964	18.3		1988	11.3	
1965	17.0		1989	4.1	
1966	10.7		1990	3.8	
1967	-5.7		1991	9.2	
1968	-4.1	4	1992	14.2	9
1969	16.9		1993	13.5	
1970	19.4		1994	12.6	
1971	7.0		1995	10.5	
1972	3.8		1996	9.6	
1973	7.9	5	1997	8.8	
1974	2.3		1998	7.8	
1975	8.7		1999	7.1	
1976	-1.6		2000	8.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表现为负值，分别为-0.3%、-27.3%、-5.6%、-5.7%、-4.1%和-1.6%。古典型经济衰退造成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以行政手段强行启动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导致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一种反映。改革后的四个周期，经济增长率仍然有所波动，但GDP增长率一直表现为正值，即使在经济周期的谷底，经济增长率也在零值之上，呈现出典型的增长型^①（即经济总水平相对值的下降）经济波动。

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92年达到峰值后，已经连续8年持续下降，呈现出明显的经济衰退。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率仍然处于比较高的水平(1999年为7.1%)，很多人认为，从全球经济增长来看，这种经济增长率仍然处于高位，体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不存在经济衰退。需要明确的是，经济衰退是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它所表示的是经济波动对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冲击，并不是对经济增长率绝对值的分析。经济衰退可以表现为古典型的，也可能呈现为增长型

^① (美) michael.p.niemira and philip.a.klein:《金融与经济周期预测》，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

的。无论是古典型的经济衰退，还是增长型经济衰退，都反映着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我国在本次经济周期中出现的是一种增长型经济衰退。增长型经济衰退是我国改革后经济周期的重要表现，也是我国价格总水平紧缩的现实经济环境。

五、我国经济波动周期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波动主要受政府计划所左右，是一种“计划周期”，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波动更多的受到市场机制影响，是一种“商业周期”。经济波动的计划周期和市场机制几乎没有关系，它是由自上而下的一致性扩张和收缩造成的。这种周期波动的扩张或收缩是通过最高经济决策层的行政命令或计划指令逐级垂直下达来发动的。各经济层次，包含微观经济单位并没有市场经济下那样的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机制，但各层次都以超额完成计划或指令为荣，各级领导人也可以因其“政绩”显著而得到升迁或嘉奖。在缺乏市场机制作用的情况下，产品的过剩或不足，是无法从生产企业中反映出来的。于是，在接到生产指令或计划后，自上而下各级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加码”行为。这种机制自然会使企业不顾一切地追求数量和速度指标，而不顾效益如何，因此，实际上，整个经济中都充斥着一种扩张的机制。当最高经济决策者在迅速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水平的思想指导下，制定出高速度的计划指标或高产量指标时，国民经济就会在上述扩张机制作用下，形成扩张的态势。整个经济的扩张只有在严重的生产结构失衡或供给“瓶颈”制约下，才可能发生停顿或收缩，当然，收缩的指令或计划也要由上而下贯彻下来。经济波动的计划性非常强烈，集中体现为一种受行政手段控制的“计划周期”。

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体制的根本变化必然造成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本变化，相应地，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即由计划对经济单位和企业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的自动调节。市场机制的出现，导致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这些机制又都围绕着市场竞争和利益得失逐渐展开。计划机制驱动的经济波动力量减弱，市场经济中利益机制驱动的经济波动力量增强，“商业周期”逐步形成。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是逐渐让位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它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并存的，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转轨时期，相应地“商业周期”具有一定的不完全性。

六、我国经济运行周期中价格总水平波动的实证相关分析

这里我们采用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对我国经济运行中价格总水平的波动状况进行分析。与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相伴随的物价变动情况如下表。

由下表可见，改革以前我国的价格由于主要受计划指令的影响和行政手段的调控，总体上看变动较小，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稳定运行的状态，同时，其波动变化与经济运行周期也不完全吻合。这种状况主要体现于第2、3、4三个经济周期中，集中表现为当经济运行处于高位的时候，价格却未必就是相对高位，有时则处于相对低位甚至呈现为负增长，如1958年GDP为21.3%，而当

年的商品零售物价上涨率只有 0.2%，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涨率更为负增长(-1.1%)，二者均为该经济运行周期的最低水平。再如，1963~1966 四年，我国 GDP 增长率均在 10%以上，最高的 1964 年达到 18.3%，而相应的商品零售价格和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涨率却均呈现为负数，下降最大的 1963 年达到 5.9%。而当经济运行处于低位的时候，价格水平却不一定是低位，有时甚至恰恰处于高位，如 1961 年我国 GDP 增长率为-27.3%，为该周期的最低水平，但商品零售价格和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涨率却分别为 16.2%和 16.1%，均呈现为该周期的最高水平。这充分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规律悖离所导致的经济参数的畸形或扭曲。

我国经济运行周期中价格总水平波动情况表

年份	商品零售物价上涨率 (%)	居民消费物价上涨率 (%)	经济周期序号	年份	商品零售物价上涨率 (%)	居民消费物价上涨率 (%)	经济周期序号
1953	3.4	5.1	1	1977	2.0	2.7	6
1954	2.3	1.4		1978	0.7	0.7	
1955	1.0	0.3		1979	2.0	1.9	
1956	0.0	-0.1		1980	6.0	7.5	
1957	1.5	2.6		1981	2.4	2.5	
1958	0.2	-1.1	2	1982	1.9	2.0	7
1959	0.9	0.3		1983	1.5	2.0	
1960	3.1	2.5		1984	2.8	2.7	
1961	16.2	16.1		1985	8.8	9.3	
1962	3.8	3.8		1986	6.0	6.5	
1963	-5.9	-5.9	3	1987	7.3	7.3	8
1964	-3.7	-3.7		1988	18.5	18.8	
1965	-2.7	-1.2		1989	17.8	18.0	
1966	-0.3	-1.2		1990	2.1	3.1	
1967	-0.7	-0.6		1991	2.9	3.4	
1968	0.1	0.1	4	1992	5.4	6.4	9
1969	-1.1	1.0		1993	13.2	14.7	
1970	-0.2	0.0		1994	21.7	24.1	
1971	-0.7	-0.1		1995	14.8	17.1	
1972	-0.2	0.2		1996	6.1	8.3	
1973	0.6	0.1	5	1997	0.8	2.8	
1974	0.5	0.7		1998	-2.6	-0.8	
1975	0.2	0.4		1999	-3.0	-1.4	
1976	0.3	0.3		2000	-1.5	0.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注：居民消费价格由于统计原因 1984 年以前为职工生活费用价格。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引入了市场机制，经济参数也逐步归位，得以承担起真实反映经济运行状况的角色和重任，价格的波动变化走势也基本与经济运行周期趋于一致。尤其是 20 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价格变动与经济周期的这种一致性趋势更加明显，即价格的升降变化与经济的扩张和收缩基本趋于一致。

七、改革前后我国价格总水平波动周期的特征变化

前面我们已经述及，长期以来由于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价格的波动变化并不完全与经济运行周期相一致，实际上即使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种种原因也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完全一致。以下我们将依照价格波动变化的实际划分运行周期，主要考察改革前后我国价格波动的特征变化（详见下表）。

1953~2000年我国价格总水平的波动情况表

年份	商品零售物价 上涨率 (%)	居民消费物价 上涨率 (%)	周期 序号	年份	商品零售物价 上涨率 (%)	居民消费物价 上涨率 (%)	周期 序号
1953	3.4	5.1	1	1977	2.0	2.7	6
1954	2.3	1.4		1978	0.7	0.7	
1955	1.0	0.3		1979	2.0	1.9	
1956	0.0	-0.1		1980	6.0	7.5	7
1957	1.5	2.6	1981	2.4	2.5		
1958	0.2	-1.1	1982	1.9	2.0		
1959	0.9	0.3	1983	1.5	2.0		
1960	3.1	2.5	1984	2.8	2.7		
1961	16.2	16.1	1985	8.8	9.3		
1962	3.8	3.8	1986	6.0	6.5		
1963	-5.9	-5.9	1987	7.3	7.3	8	
1964	-3.7	-3.7	1988	18.5	18.8		
1965	-2.7	-1.2	1989	17.8	18.0		
1966	-0.3	-1.2	1990	2.1	3.1		
1967	-0.7	-0.6	1991	2.9	3.4		
1968	0.1	0.1	1992	5.4	6.4	9	
1969	-1.1	1.0	1993	13.2	14.7		
1970	-0.2	0.0	1994	21.7	24.1		
1971	-0.7	-0.1	1995	14.8	17.1		
1972	-0.2	0.2	1996	6.1	8.3		
1973	0.6	0.1	1997	0.8	2.8		
1974	0.5	0.7	1998	-2.6	-0.8		
1975	0.2	0.4	1999	-3.0	-1.4		
1976	0.3	0.3	2000	-1.5	0.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注：居民消费价格由于统计原因 1984 年以前为职工生活费用价格。

上表显示，改革前后我国价格总水平波动在状态特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波动的高度。波动的高度是价格波动周期内波峰年份的数值。改革前 5 个周期的平均高度商品零售价格为 4.68%，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为 5.1%；改革后 4 个周期平均高度商品零售价格为 12.75%，居民消费价格为 13.725%，改革后两种价格波峰高度均比改革前提高了 1.7 倍。这表明，随着我国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供求关系在价格形成过程中

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抑制型通货膨胀所形成的物价上升压力，在市场化价格改革的进程中得到释放。

(2)波动的深度。波动的深度是谷底年份的价格指数值。改革前 5 个周期的平均深度商品零售价格为-1.32%，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为-1.42%；改革后 4 个周期平均深度商品零售价格为 0.425%，居民消费价格为 1.1%，改革后两种价格分别比改革前平均抬高了 132.2%和 177.5%。改革前后比较，谷底的抬高非常明显。这表明，到目前为止，随着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推进，我国的总体价格水平处于一个上升的过程。这一特征在改革后的前 3 个周期更为明显。

(3)波动的振幅。改革前价格波动的振幅除第 3 个周期外，波动的幅度基本在 5%以下，平均振幅商品零售价格为 5.96%，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为 6.34%；改革后价格波动的振幅不断放大，从 1%左右上升到 25 以上，平均振幅达商品零售价格为 12.325%，居民消费价格为 12.625%，比改革前分别上升了 1 倍左右。由此不难看出，改革以来我国价格总水平的波动性在不断扩大。

(4)波动的收缩期长度。收缩期和扩张期是相对应的，改革前收缩期比较短，商品零售价格和职工生活费用价格分别为 2 和 2.2 年，扩张期较长商品零售价格和职工生活费用价格分别为 2.8 和 2.6 年；改革后两种价格的扩张期和收缩期均有所延长，都为 3 年，但收缩期延长的速度明显快于扩张期延长速度，这实际上预示着收缩期将相对拉长而扩张期将相对缩短的价格波动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改革前价格周期性波动状态的特征概括为：波峰低、谷底浅、振幅小、扩张期长、收缩期短。改革后价格波动状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波峰高、谷底抬升、振幅扩大、收缩期延长速度相对加快、扩张期延长速度较慢。改革前后价格波动状态的特征可以更简洁地表达为：由改革前的“低位——平缓”型转为改革后的“高位——大起大落”型，由改革前以扩张期为主的“慢升快降”型转为改革后扩张收缩期较为均衡的“陡升陡降”型，并逐渐显示出以收缩期为主的“陡升缓降”型发展趋势。

八、我国经济运行周期中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交替转换出现

我国价格波动从改革前的“低位——平缓”型“慢升快降”转变为改革后的“高位——大起大落”型“陡升缓降”，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我国价格总水平的波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过去单一的通货膨胀转变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不同时点交替出现。

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物价波动表现如何，就其波动的潜在能量看，实际上经济周期面临的是单一的通货膨胀压力。单一的通货膨胀，即无论是高潮时期还是低谷时期，都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周期不同阶段只有通货膨胀压力大小之别，不会出现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转换。相应地，经济学界关注的主要是通货膨胀问题。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价格总水平的波动性增强，通货紧缩有可能周期性地出现，过去那种单一的通货膨胀时代有可能转变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不同时点交替出现的新阶段。

首先，计划价格形成机制向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转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改革后我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逐步建立起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这种价格形成机制的转变，使得我国的价格总水平有可能周期性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计划价格机制使得价格水平处于一种超稳定

状态，价格总水平的波动在计划者的严格控制之下，价格信号几乎不反映市场供求状态，价格总水平的市场周期性波动特征被计划周期性特征替代。上表数据显示，我国改革前价格总水平虽然有升有降，但是波动幅度很小，价格总水平基本上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从1979年开始了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1979~1984年，在计划价格的框架内进行了以“调”为主的价格改革，初步改善了不合理的计划价格结构。1984~1991年我国从管理体制和价格结构两方面全面开展了“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初步形成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并存的格局。1992年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精神鼓舞下，我国以“放”为主，加快了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市场调节价的比重急剧上升，在价格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1995年生产资料价格体系中，市场调节价的比重已达77.9%，农副产品价格体系中市场调节价比重为78.6%，零售商品的市场调节价比重则上升到88.8%，我国价格形成市场化指数1995年上升到84.5%。^①

随着价格形成的市场化推进，供求关系在价格形成过程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越来越发挥出基础性作用，价格水平的波动性增强，价格总水平变动对经济运行的扰动有可能放大，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周期性出现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形成。

其次，单一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我国价格总水平的走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出单一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市场化价格改革中逐步得到释放。随着单一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价格总水平就不可能仅仅有上升的趋向，而是既有可能向上变动也有可能向下变动，通货紧缩有可能周期性地出现。

在计划价格形成机制下，我国的价格水平长期不变，农产品、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价格普遍低于价值，生产成本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供给严重短缺，大量商品凭票供应，黑市猖獗。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隐蔽型通货膨胀和抑制型通货膨胀，表现在价格总水平的走势上，虽然波动小，但波谷不断抬高。以至改革初期，随着市场调节价格比重的增加，价格总水平呈现出只升不降，或者说从改革前的慢升转变为陡升，如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波动的波峰从2.0%，上升为18.5%，再到21.7%；居民消费价格波峰由2.7%上升到18.8%，再上升为24.1%。

这种价格总水平波动形态表明，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1990以前，国民经济运行中确实一直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在此期间，价格总水平也曾有向下变动的表现，但这些价格总水平的向下变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短期下降，跌幅不深，迅速回升，其收缩期改革前商品零售价格为2年，居民消费价格为2.2年，改革后前3个周期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均为2.33年。这种短期下降、迅速回升的价格走势显示，价格上涨的压力远远大于价格下降的压力，我国的价格总水平存在着单一的通货膨胀压力。

改革后，价格总水平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改革前“低位—平缓”型“慢升快降”转变为“高位—大起大落”型“陡升缓降”。这种“缓降”表现的是价格总水平收缩期的延长，改革前收缩期平均商品零售价格为2年，职工

^①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生活费用价格为 2.2 年，改革后两种价格收缩期有所延长，均为 3 年，比改革前分别延长了 50% 和 36.4%。这种价格总水平收缩期的延长实质上表明我国的价格总水平已经面临着一定的向下变动的压力。这是因为，经过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上半期多次提价后，改革之初面对的价格扭曲情形已经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抑制型通货膨胀所形成的物价上升压力，在市场化价格改革进程中得到释放，“多数工业制造品和食品的价格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国际价格的平均水平”^①。

在这种背景下，价格总水平就不可能仅仅有上升的压力，而是既有可能向上变动也有可能向下变动。改革后的第 4 个周期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一个价格周期，这个周期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其收缩期已达 5 年，收缩期异常扩张，为建国以来之最，大大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平均收缩期，为前 3 次价格波动收缩期的总和；振幅异常放大，本次商品零售价格波动的振幅达到 24.7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达到 25.5 个百分点，远远高于 4 次价格波动的平均振幅 12.325 个百分点和 12.625 个百分点，比前 3 次价格波动的总振幅还要略高；价格总水平大幅下降，从 1994 年达到最高点后，连续 3 年表现为负值，1998~2000 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分别为 -2.6%、-3.0% 和 -1.5%，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分别为 -0.8%、-1.4% 和 0.4%，预计 2001 年上述两种物价将呈现为负值。下降的年度长度是改革以来最长的，累计下降的幅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所没有的。在我国经济转型的现阶段，收缩期不断延长，表明价格总水平向下运动的压力已经形成，应该说价格总水平膨胀和紧缩的周期性交换是有可能的。

再次，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周期性出现依赖于一定的市场条件，如果消费者面对的是短缺经济背景，卖方统治买方，生产者统治消费者，买方之间的竞争强于卖方之间的竞争，消费者所做的就不是“等待”而是“抢购”，结果是物价上升。因此，通货紧缩的压力通常发生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的低潮期，一般不会发生在短缺经济的调整期，短缺经济始终存在通货膨胀压力，在周期的不同阶段，只有压力的大小不同，而不会消除压力。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长期反复起作用的经济现象是资源约束型短缺，卖方市场占主导地位。根据科尔内的分析，产生短缺的机制是纵向的数量计划调节和由于软性预算约束所产生的购买冲动、囤积存货、投资饥渴。这样一种扩张机制使得“我国经济波动的经常性特征是造成总需求过度膨胀的经济过热。防止大起大落波动的重点应放在防止经济过热上”^②。在物价水平的调控上也就自然表现为以反通货膨胀为主导。

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有效需求不足是宏观经济的常态。我国在 1992 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的近几年，经济运行中已经出现了“总量过剩”。据中国信息中心的最新调查，中国目前的商品和服务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供大于求和供求平衡，不存在供不应求现象^③。应该说，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改革后生产能力的增强使得我国在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短缺经济背景下单一通货膨胀压力的市场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立在买方市场基础上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既可能表现为供求失衡引起的通货膨胀

①③陈东琪：《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互换位时代的政策操作》，《财贸经济》1998 年第 11 期。

②洪银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9 页。

波动，也可能因为供求失衡引起通货紧缩。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单一通货膨胀”时代已经过去，价格总水平波动进入了市场性周期波动的新阶段，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有可能周期性地出现，我们应当对传统的单纯“反通货膨胀政策”进行动态化的调整，将反通货膨胀政策和反通货紧缩政策在不同时点上结合起来。

第二章 关于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一般理论分析

一、关于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内涵和本质

(一) 通货紧缩的含义和本质

1、国内关于通货紧缩概念的讨论。我国经济理论界对通货紧缩的讨论始于1997年底，是与我国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形势紧密相联的。关于通货紧缩基本概念的认识，目前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是“单要素说”。即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水平普遍的、持续的下降。如：章奇、陈选娟认为：“通货紧缩一定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吗？回答是大多数情况下的确这样，但也并非一定如此。例如，众所周知日本已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泥潭，自90年代以来产出水平虽然随着价格水平的下跌而下降，但货币供应量却并没有减少，甚至有小幅的增加。通货紧缩一定意味着经济萧条（衰退）吗？回答是否定的。的确，在“大萧条”年代，有效需求不足使价格水平下降近25%，出现了产出下降、失业骤增、银行破产及股市崩溃的局面。但历史上也不乏有许多物价持续下跌，但经济却不断增长的现象。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下降了50%，而其经济实际增长率却达到了4.3%。进入90年代，美国的通胀率不断降低，1998年消费物价指数增加了不到1.5%，比1992年下降了近73%，但经济增长率仍高达4.5%。”“因此，通货紧缩，只有一个定义，即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①谢平、沈炳熙认为：“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反的一种经济现象。通货膨胀是货物与服务价格普遍地上升，通货紧缩则是货物与服务价格普遍持续地下降。”^②胡鞍钢认为：“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定义正好相反，是指货物与服务的价格普遍不断下降。”^③

第二种是“双要素说”。即认为通货紧缩是指货币供应量过少，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量，从而引起的物价全面、持续的下降现象。这里特别强调物价下跌的货币因素。如吴军认为：“通货紧缩意味着货币供给的紧缩和物价的持续下跌。前者是通货紧缩的基本内容，后者则是通货紧缩的现象或标志。”但“就一种宏观经济现象而言，通货紧缩的实质是经济的萎缩或衰退，是经济萎缩或衰退的货币现象或金融现象。”^④曾康霖认为：“通货紧缩就是流通中作用于商品和劳动交换的货币减少，它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价格的持续下降。”“这里把通货减少当成是物价下跌的‘因’，而物价下跌是通货减少的‘果’和表现，是要表明‘通货紧缩’带来的是单位货币价值的升值，使单位货币的购买力提高，相应地物价下跌。”“‘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是一个中性概念，即只是借用物理学上的一个名词来表述货币流通状况，它本身没有褒义和贬义。”^⑤

①章奇、陈选娟：《通货紧缩与宏观经济稳定》，《改革》1999年第6期。

②谢平、沈炳熙：《通货紧缩与货币政策》，《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

③胡鞍钢：《我国通货紧缩的特点、成因及对策》，《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④吴军：《论通货紧缩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农村金融研究》1999年第4期。

⑤曾康霖：《关于通货紧缩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99年第11期。

第三种是“三要素说”。即通货紧缩应包括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与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认为：“通货紧缩最简单的意思是指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但“强调通货紧缩的‘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即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通货紧缩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其理由是“虽然观察物价水平是比较直观地把握通货紧缩的办法，但判断通货紧缩，最重要的还是要从货币流通量去考察。”

“作为通货膨胀的对立面，通货紧缩也是一种货币现象，即它首先是货币流通量的下降，而不等于价格下降。更进一步，通货紧缩首先是一种与货币流通量密切的货币现象。不管出现通货紧缩是人为的还是自发(内生)的，直接的表象应该是货币流通量的减少；所以，货币供应量可以作为一个近似的度量指标。强调通货紧缩是货币现象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它不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话，那么指出通货紧缩的政策含义就不清楚了。”“如果说通货紧缩的‘两个特征’是思辨演绎的结果，那么‘一个伴随’则是从历史事实中归纳出来的。”

“两个特征是对通货紧缩本质的一个逻辑描述，用两个特征做标准去检验我们能找到的所有历史数据，就得到凡是两个特征同时发生的时候，都伴随着经济衰退。因此，用“两个特征、一个伴随”来把握通货紧缩比较全面，与历史事实相吻合，较好地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单纯强调物价水平持续下降是不充分的)。”^①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一种经济政策。如许光建认为：“通货紧缩，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是与经济增长、就业、财政收支等相联系的宏观经济现象。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可以说通货紧缩是一种经济政策，但其确切的含义应是以通货紧缩为结果的宏观紧缩政策。”^②

2、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通货紧缩定义的表述。西方国家虽然有着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但总的看，发生通货紧缩的阶段相对来讲是较少的或较短的，因此，西方经济理论界对通货紧缩的深层次系统研究也较为鲜见。应该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通货紧缩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例如，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就曾多次谈到通货紧缩问题，他曾经讲到过：“只要金本位继续存在——意味着任何地方的国际商品价格必须保持一致——就必然会引起通货紧缩的竞争性活动，我们每个国家都力图使自己的价格下降速度比其他国家快，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失业扩大，企业亏损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③显然，他使用通货紧缩所要表达的涵义是指价格水平的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很少发生通货紧缩，而持续发生通货膨胀，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连通货紧缩这个名词都很难看到，当时比较流行的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教程对通货紧缩几乎只字不提，如阿克利著《宏观经济学》、德尔别尔格和麦克多噶尔著《宏观经济学》、夏皮罗著《宏观经济分析》都几乎没有提到通货紧缩。甚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不少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程对通货紧缩只字不提，如由多恩布施和费希尔著的被誉为标准

^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

^②许光建：《关于通货紧缩的几个问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9年第4期。

^③J.M.凯恩斯：《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